

第一章

欧美日学者论日本经济的前景

日本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其经济前景如何，自然会受到欧美学者的关注，日本国内的学者更对本国经济的前景深表关心。本章试对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日本经济前景的看法做一归纳和总结。

第一节 欧美学者论日本经济的前景

关于欧美学者对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原因及前景的看法，笔者由于受所学外语为日语的限制，仅从翻译成日文或中文的欧美学者的著述中查到少许相关资料。现将其大体归纳如下。

一、悲观论

1. 比尔·埃莫特的观点

在 1988 年日本经济炙手可热之际，以一本《太阳也会西

沉》而震惊世界的比尔·埃莫特（Bill Emmott，从 1993 年起担任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主编），在 1998 年 5 月的日文杂志《潮》上发表了标题为《对无能的日本政府的失望》的文章。他在该文中分析了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原因。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的政治家和官僚没有本着积极负责的态度来处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他们甚至有意识地逃避严峻的现实，基本上没有拿出什么办法。因此，只能说他们无能。改革，必须抓住时机迅速实行。要想改革，必会伴随痛苦，但越是这样越不能拖延。日本正是因为将改革日程一拖再拖，才致使改革难度不断加大，改革风险日益增加。如果日本政府尽早采取措施就会避免如今这种严重事态的出现，对此他感到十分遗憾和失望。另外，日本企业也负有责任。除索尼、丰田之外的大多数日本企业都抱着企业系列、终身雇佣等传统制度不放，没有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做出积极反应。

他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造成日本目前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僚的权限过大且不明确，大到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法律 and 政策的程度，其中大藏省官僚最为典型。他认为，大藏省的官僚与企业之间保持密切的关系，这种情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决不是日本所特有的。但是，在日本，这种关系过于密切，企业接待官僚的费用日益庞大，已经超出了接待、请客吃饭的界限，明显属于贿赂行为。他认为，必须对此进行彻底改革。^①

2. 理查德·卡茨的观点

美国资深日本问题专家、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理查德·卡茨在其著作《致使日本走向腐朽的体制》中，对被称作战后奇迹的日本的高速增长急剧钝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对日本目前“病状”所做的诊断，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自 1973

年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转向保护弱者，导致日本出现了生产率高低悬殊的产业同时并存的奇妙的“二重经济”。在日本，过去成功的体制现在已经腐朽，但依然在运行着。他认为，致使日本陷入今天这种困境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是其混乱的政治。日本所有的政党中改革派与保守派混杂，特别是在野党数目多且势力弱小，对于什么是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等问题根本没有一致的看法。其结果，无论是自民党还是在野党，都在谋求“没有痛苦的改革”，所以，根本做不到对日本的现行体制进行“大手术”。

他认为，日本要想解决自身的问题，必须经历像中国的毛泽东体制向邓小平体制转变的那种“体制变革”。长期推行的制度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被推翻。这个过程大概需要 10 年乃至 20 年。只有出现具有改革能力的政治家，其领导才能得到国民信赖之后，才能完成那种大变革。为此，必须改革选举制度，废除致使小党乱立的比例代表制，结束自民党一党支配局面，建立代表广大中产阶级意志的保守、激进两大政党，这样才能实现政权交替。但是，1993 年，支持自民党分裂的日本财界，如今又支持自民党和自由党联合政权。财界的这种做法是大错特错了。只要日本这种政界、财界的混乱局面持续下去，日本的体制转换就不会取得成功。^②

3. 约翰·奈斯比特的观点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其 1996 年出版的《亚洲大趋势》中指出“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的经济已达到了极限，开始呈现出衰退的趋势”，日本“经济增长已达到了极限。它在亚洲和世界的相对经济地位已呈下滑趋势”。^③“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每况愈下，这是因为：战后一代曾以死拼硬打造就了日本世界一流的经济地位，但接替他们的新一

代并不愿自讨苦吃；日本的过度管制使它的经济受到了窒息。例如，日本首先开发了移动通讯系统，但由于严格控制发展而使得美国和欧洲后来居上；性别与年龄歧视依然普遍存在；由于人口出生率低，生活水平高，日本人口老龄化超过其他国家。到 2020 年，将有 1/4 以上的日本人超过 65 岁；虽然平均工作日减少，但企业高层人士普遍工作超负荷。1993 年，一周平均工作时间首次低于 40 小时，低层职员越干越少，高层职员劳累过度，死亡率高；人力、物力、信息资源过度集中于东京，而在现代城市格局中，城市功能必须进行合理疏散、合理布局，才能整体协调、提高效率。”^④

4.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观点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于 2000 年 12 月 18 日发表的特别报告《2015 年的全球趋势》指出，关于日本的前景有几点不明确之处，首先就是日本能否为再次恢复以往那种经济活力、减缓与其他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衰退速度而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今后 15 年，日本的经济实力将比 20 世纪 90 年代强大，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将相对下降。大多数专家都认为，日本在 2015 年之前，将很难保持住现在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地位。日本政府在此之前并没有让人看到控制住作为亚洲的领导的作用正逐渐丧失的事态所必要的、积极地推进困难的经济改革的姿态。^⑤该报告认为，日本现在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笔者认为，可能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来排序的。1999 年，按 PPP 衡量的 GNP，日本为 30 429 亿美元，排在美国（83 501 亿美元）和中国（41 122 亿美元）之后，居世界第三位。^⑥

二、乐观论

1. 哈曼·肯的观点

1967年，美国未来学者、哈迪逊研究所所长哈曼·肯（1922年生于美国的俄裔犹太人）在《公元2000年——33年后的世界》一书中指出，2000年，日本人均GNP将仅次于美国，2020年，GNP总量将超过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一。1968年，他在日文杂志《潮》新年号上发表的论文中明确提出：“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他列举的理由是：日本教育的普及和高质量的人才、丰厚的资本、发展新产业的强烈欲望、高储蓄率等。同年10月，他在京都大学讲演时又提出，在2000年日本的人均GNP将赶上或超过美国。其理由是：日本仍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富有进取精神、国民富有革新精神等。哈曼·肯大概称得上世界上第一位预言“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的学者。

2. 卡莱尔·班·沃鲁菲莱恩的观点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卡莱尔·班·沃鲁菲莱恩（Karel van Wolferen）对日本经济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他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对日本的政治、经济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尽管对日本并不比欧美逊色的创业精神被中央官僚体制制约了的状况感到悲观，但他仍然坚持认为，日本能够成为超越“欧美标准”的非常强有力的工业国。今天的日本经济，尽管增长率很低甚至为零，但看起来还是非常健全的。当然，也并不是没有问题。日本的资本没有得到高回报，利率过低，还有不良债权问题、赤字国债问题、年金问题、老龄化问题、失业问题等等，但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回顾日本经济的历史，这些曲折经常出现。世界各主要经济报刊认为，日本经济已经

不行了，日本的产业对美国及其他国家已经不构成威胁了。这种看法大错特错。日本经济尽管有患病的部分，但从整体来看，还没有到非常糟糕的程度。例如，一般来说，不良债权问题被人们视为最大问题。实际上，这些人并没有理解这一问题的本质。日本的银行与欧美的银行传统不同，运行模式也不同，不能用华盛顿和伦敦的基准来衡量。^①

3. 迈克尔·波特的观点

美国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教授和两位日本学者竹内弘高（一桥大学教授）、榊原鞠子（美国加州大学副教授）在他们合著的《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一书中指出，他们不同意日本已经丧失竞争力的看法。他们认为，在许多领域里，日本公司仍有竞争力。经过几十年的投资积累，日本在商业创新领域内已经步入了世界顶级水平，拥有很高的国际专利和人均科学文献资料出处的比例。尽管日本因自身的科学技术体系所存在的漏洞而经历了一些痛苦，但是，日本仍领先于绝大多数国家。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也呈上升之势。日本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几乎都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并且特别有献身精神，这构成了一项资产，能夸口说自己也有这种资产的国家并不多。日本能够保持竞争力。真正的问题是：它是否愿意选择竞争这条路？对于该国是否有能力接受国内外环境的根本变化，日本国内外都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许多人认为，现在统治日本政府机构和公司的这一代人对现状很固执。日本最苛刻的批评家认为这一代人缺乏意志。我们则对这一代人抱有更多的希望。我们相信日本是有意志力的，只是缺乏对前景的了解和指导而已。日本是一个崇尚传统、鼓励稳定性的国家，但是，在它的康宁处于危机之中时，这个国家也表现出了非常强的转变自身的能力。

该书作者认为，正因为有如下 7 个方面的催化剂，才促使日本必须变革：

- (1) 外方投资者将会变成日本公司更加重要的股东，日本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将逐渐消失；
- (2) 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正在通过并购（M&A）的方式进入日本；
- (3) 传统的大企业集团将会解体，将带来新的机会，包括新的融资方式和更多的各有侧重的战略；
- (4) 日本政府正在进行组织机构的改革。如大藏省的金融监督职能将会移交给新成立的金融厅；
- (5) 新一代的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将会在许多公司中接过领导权；
- (6) 新一代创业型公司的数目正在增加；
- (7) 年轻的日本人具有更多关于信息技术的知识，而且在接受变化时更加灵活。他们将成为改变所在公司和政府政策的驱动力量。

该书在结尾处指出，今天，日本必须走出质量竞争的局限，开始在战略和创新上开展竞争。日本公司有必要制定独特的战略，这些战略应该能够带来实际的盈利能力。为了做到这一点，日本不仅需要在产品上进行真正的创新，而且也必须在竞争方式上进行真正的创新。日本过去的转型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以下情况，只要意识形态有了转变，日本将有能力迅速地前进。重要性不次于质量转变的新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要在全国内展开。日本即将发生下一步重大转变，我们对此充满希望。^⑧

第二节 日本学者对日本经济前景的看法

一、日本学者对日本经济前景的四种代表性看法

笔者大体上将日本学者对日本经济的前景的看法分为四大类，即悲观论、乐观论、五年决定论和不计较经济增长论。

1. 悲观论

伦敦大学和大阪大学的名誉教授森岛通夫（被誉为“把日本的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是对日本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日本为什么没落？》（岩波书店，1999年3月第1版）中对日本经济前景的预测结论是，21世纪中叶的日本，即使在经济方面勉强凑合，在国家的影响力上也将毫无作为。他认为，日本现在正处于危险状态。通常所说的没落，多指经济上的衰落，但是从明治维新就可以清楚，没落和贫困未必同时发生。当时德川体制已经穷途末路了，但在经济上，国民并没有在涂炭中挣扎。危机感是因政治的贫困而产生的，而不是因经济产生的。没落既有由政治而引起的，也有因经济而引起的。日本在过去被认为是政治三流、经济一流，但即使是经济陷于困境的现在，海外对日本抱有期望的仍然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日本如今的没落和明治维新时一样，是由政治引发的。这可能是日本的传统。下个世纪的日本，将与幕府末期一样，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被人忽视的配角。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德川时代（1603~1867年——笔者注）是等级差别和地区差别都很悬殊的时代。因此，即使大部分人没有危机意识，也还是出现了一小部分“忧世志士”，由于他们的奋起拯

救了日本。可是到 2050 年时，日本无论是城市还是乡下的人们都受到同样的教育，并且等级差别很小，可以预想那时日本人的资质将会变得不好（这个预想是本书的焦点），既没有精华也没有领头人。因此，人们在经济上越享受，就越不愿意打破安逸，甚至他们可能希望什么也不干等着安乐死。那么 2050 年日本的经济将是什么状态呢？很遗憾，现在的经济学无法预测 50 年后的经济，那时将有两种可能：一是如果幸运的话，那时将像德川时代末期那样在经济上比较舒适，但国民对政治的没落感到“无能为力”；二是如果那时的经济状况恶化的话，事态将是最糟的，失业者将充斥大街小巷。

森岛教授进而指出，如果根据古典的景气观察方法，经济危机将时隔 7~10 年发生一次，那么算上这次到 2050 年将发生 6~8 次危机。如果能顺利摆脱这些危机的话，就会出现第一种可能。但是到那时也难以避免政治上的沉滞。因此，如何从“政治的没落”这个怪圈中挣脱出来，就成了日本的核心问题。森岛教授认为，唯一有效的方案是构建亚洲共同体。可是日本人好像并不喜欢这个方案，因为现在的日本人有一种在亚洲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森岛教授认为，日本只能二者择一：拒绝亚洲共同体方案，甘心没落；或者接受此方案向前迈进。如果除去日本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结成了共同体的话，日本将在亚洲处于孤立地位，那样的话，事态就绝望地不可挽回了。

为什么森岛教授在 1982 年还出版了题为《日本为什么“成功”？》的著作，而如今却预想日本将没落下去呢？作者在该书共八章中分五章阐述了其预测根据：第一章为“方法论”；第二章为“人口的分裂”，主要内容是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以后出生的“新人类”对社会变化不感症的悲剧；第三章为“精神的荒废”，主要内容为日本人由意识形态的空白而引起的职业伦理的颓废；第四章为“金融的荒废”，主要内容为日本人的土地渴望

和土地崇拜、土地泡沫的背景；第五章为“产业的荒废”，主要内容为日本主银行制、经营体制和政、官、财“铁三角”的弊端；第六章为“教育的荒废”，主要内容为日本的高学历和高升学率造成教育质量的低下；第七章为“唯一的拯救方案”，即作者提倡的包括日本、中国、朝鲜半岛、台湾地区、琉球群岛在内的“东北亚共同体方案”；第八章为“影响拯救方案的障碍”，主要内容是日本人应该对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有正确的认识。1998年，韩、中两国首脑访问日本时，日本并没有向这两国首脑表示建设东北亚共同体的意思，作者得知此情况后对日本的未来表示非常悲观。

2. 乐观论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小宫隆太郎可以称得上是对日本经济的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代表人物。《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1月1日~8日分6次刊发了小宫教授的题为《从中长期的视点来看——日本经济的课题》的论文。小宫教授在该篇论文中指出，现在日本的气氛是过于悲观了。小宫对日本经济的未来表示乐观的理由是，从长期来考虑经济增长时，供给方面是重要的。战后的日本，从工业国家中最低的收入水准、仅为美国的1/20出发，经过半个世纪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准。现在自然不能再指望还能达到过去的5~10%的高增长率。经过半个世纪，急速增长的结果是，日本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已经到了必须进行重大改革的时期。但是，从长期来看，日本社会充分具备经济稳健繁荣的基础条件。北欧各国和瑞士达到了世界最高的收入水准，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那么多的世界性大企业、大银行，也没有硅谷、微软。这些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能力很高的国民和良好的政府基础之上的。教育得到普及、收入分配比较平等，为解决经济、社会问题，国民容易达成共

识。国民有理性、有良知、顺守法律、尊重基本的人权、犯罪率低、治安良好、劳资关系稳定。北欧各国的社会保障在世界上最为周到，人们很少为现在以及将来的生活不安而烦恼。这些都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条件。在和平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年代，满足上述各项条件的国家即使很小，也能实现经济繁荣，达到很高的收入水准。在今后的半个世纪，日本也完全能够满足上述各项条件，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繁荣的国家而存在。

小宫教授在该论文中接着列举了日本从中长期来看面临的重要经济问题，如人口减少、政府的规模、公债的负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职业伦理和责任体制等。他在该论文中主要阐述了前三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都是相当严重的，要想克服每一个难关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回顾一下过去半个世纪日本的历史：战败初期的经济破灭和混乱、冷战时期保守派和革新派的对立、公害问题、两次石油危机等，诸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难题在战后一代集中智慧、达成共识下，将它们逐个超越，构筑了富裕的社会。既然如此，下一代也会集中智慧，面对各种困难并将其克服，将繁荣的社会发展下去。小宫教授对此深信不疑。^⑨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日本经济的前景，在森岛、小宫之间还引发了一场大论争。论争的起因是在 1999 年出版的森岛的《日本为什么没落？》一书中，阐述了 1998 年在悉尼召开的会议上他对小宫关于日本经济发表的“乐观论”予以批评的理由。于是，小宫在《论争东洋经济》杂志的 1999 年 11 月号、2000 年 1 月号上发表了题目为《对森岛通夫著〈日本为什么没落？〉的批评性书评》的文章。在 2000 年 3 月号上，刊登了森岛的以《由小宫隆太郎的书评想到的》为题的反驳。这就是在两位均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森岛通夫和小宫隆太郎

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日本经济前景的大论争。两人的分歧，一言以蔽之，小宫持乐观论，而森岛则持悲观论。在这场近乎争吵的大论争发生之后，有位在日本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说，“对于经济学大师之间的论争，我们只能悚然而立”。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敢发表评论，只有奥野正宽（比较制度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笔者注）在《论争东洋经济》2000年5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对两人谁也不得罪的题目为《透过“小宫、森岛论争”所看到的》的评论。后来，《经济学家》杂志编辑部请没有直接聆听过两位大师授课的法政大学教授桥本寿朗写了一篇题目为《新资本主义的创造——用适应环境变化的创造性经济活动来拯救日本》的文章。他的评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信条上与森岛有同感，在对日本经济的现状认识、展望上从小宫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将两位大师比做“鸫鸟”。他还指出，在森岛的著作及文章中并没有提到创新，在小宫的反驳性文章和奥野的评论中没有提到信息革命，这些都是令人遗憾的。^①

3. 五年决定论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1938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在东京大学获得理论经济学硕士学位，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然后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任副教授，京都大学教授，自1984年起任斯坦福大学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比较制度理论的权威，并被认为是日本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笔者注）在世纪之初指出，21世纪的日本经济取决于最初的五年能否完成政治和企业（组织）的两大改革。笔者将他的这一观点概括为“五年决定论”。

（1）政治改革

他将现代日本的国家结构定性为“官僚制多元主义”。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初期形成了大企业、保守政党、官僚的“铁三

角”结构，此后，随着大众民主主义的发展，该结构扩展到许多产业及利益集团，起到了保护既得权益的作用。此结构在“馅饼”（又可称为“蛋糕”——笔者注）做大的过程中，起到了收入平等化及安全网的作用，但在赶超欧美的任务完成之后，此结构便无法维持下去了。因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拥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效率部门为保护低效率部门及福祉部门支付了费用，那么高效率部门因国际竞争的加剧就承担不了高额的费用了。近年来，许多将会给子孙后代造成负担的问题都被搁置下来。利益集团、管辖省厅和族政治家（或称“族议员”。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议员们总是代表着特定行业、地区和集团的利益。在日本，共同的利害关系使议员们公开结成集团，千方百计为自己代表的行业、地区和集团谋取“政治资源”，这种利害关系比欧美更露骨，在日本被称为“族议员”，如农林族、邮政族、建设族、工商族等——笔者注）相互勾结、咬住既得利益不放的政经结构必须改变。尽管关于此结构应该改变成什么样子，谁也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从最近选民对政治家的批评来看，已经出现了变化的苗头。必须通过选举这一民主主义的机制为政治家及政府机关制定规则。1993 年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的结束，就宣告了这一时代的开始。21 世纪的最初 5 年将是日本政治改革的关键时期。如果对这种“官僚制多元主义”的改革没有一个规划或构想，那么，将来必定会有更大的痛苦相伴。

（2）民间的组织改革

20 世纪 60~80 年代，日本的企业组织在组织内部信息共享、迅速生产出优质价廉的产品方面取得了成功，但由于信息技术（IT）的利用，能够共享的信息量大大增加，组织就过于肥大了。在信息化时代，如何建立快速灵活的组织，就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日本的企业至今尚未得出答案。^①

4. 不计较经济增长论

笔者认为，日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正村公宏可以称得上“不计较经济增长论”的代表人物。

在其题为《日本经济——衰退能否避免》（筑摩书房，1997年12月第1版）的著作的结尾处指出，转向“低增长”或者“零增长”（即经济增长率下降），其本身未必是日本经济衰退的征兆。就连“负增长”也未必能成为表明日本经济衰退的指标。经济增长率未必是经济活力的指标。经济能否维持动态的（适应变化的）稳定、社会能否维持动态的（内含创造性活动的）秩序，才是重要的。即使人均实际收入下降、资源消费量减少，但是只要能保护环境、维持公平分配、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维持适当的稳定装置、大多数国民过着质朴且均衡的生活、孩子们带着想要对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的存续这些本质的有意义的问题进行挑战的志向成长，那么像国内生产总值（GDP）这样的指标即使下降，也没有必要看作是经济衰退，社会解体的危险也能够排除。但是，要想达到这种状态，就必须让“政治”发挥机能，转换国家的目标或国民的目标，从根本上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变革。20世纪上半期，日本的“政治”在解决“经济”提出的问题、面对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变化转换国家的目标体系时失败了，将近邻各国的国民和日本人自身牵扯进大规模战争之中。20世纪后半期，尽管曾多次被迫必须对国家的目标体系进行重新探讨，但是日本的“政治”一直将此问题予以回避。正是因为“经济”优先已经逐渐失去正当性，但却一直固执地坚持“经济”优先，为此而付出了过于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但是人们并不想直视这个问题。如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日本人再次在让“政治”发挥机能这个问题上失败的话，其结果仍然会是毁灭性的。所说的让“政治”发挥机能，就是指要真正地强化我们社会的自我改革能力。为了不招致深刻的事态，社

会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保障言论自由、确立男女同权的普通选举制度是最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已经付出了很多牺牲，花费了很长时间。

正村教授接着指出，对于 19 世纪的改革派来说，确立自由民主主义是他们的课题，对于 20 世纪的改革派来说，确立社会民主主义是他们的课题，而 21 世纪的改革派则必须留意如下几点：

- 推行强烈意识到“地球”的政策体系。各国政府必须让国民理解不要追求短期的国家利益、而要追求超长期的国家利益以谋求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性。
- 推行强烈意识到“环境”和“资源”的政策体系。
- 推行强烈意识到“人”的政策体系。发展经济、维持社会秩序、防止文明的衰退或破灭、创造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人的行为。

不能从“质”和“量”两方面进行人的“再生产”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步入衰退和解体的道路。即使将话题限定在“经济”上，如果不考虑 1~2 年后的“经济”，也不考虑 10~20 年后的“经济”，而至少考虑 100~200 年后的“经济”的存在，那么就会清楚现在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给“人”的要素所带来的影响具有怎样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如果不能大量地培育出有能力真正抓住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并予以彻底解决的人才，那么日本的社会走向衰退将是不可避免的。

上述对日本经济未来前景的四种观点是从不同的角度考虑之后得出的。但森岛、小宫、正村这三位日本的经济学家都强调了“人”的重要性。森岛教授指出了日本如今所面临的种种严峻问题，并且认为日本人的素质今后将不断下降，即丧失改革能力、贪图安逸，所以得出了日本今后将没落下去的悲观结论；小宫教授也指出了日本经济所长期面临的种种严峻的问

题，但他站在“经验论”的基础上，认为下一代日本人也与战后的一代一样，能够克服这些困难，所以得出了日本今后还将继续繁荣下去的乐观结论；而正村教授则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不计较经济增长率是正还是负，强调了“地球”、“环境”和“资源”的重要性，但是更加强调了“人”的重要性，尖锐地指出了日本的下代人如果低能的话，那么日本的衰退将不可避免；青木教授则认为，21世纪日本经济的前景如何，取决于最初的五年政治和企业的两大改革能否成功。

二、其他日本学者及机构的看法

1. 富山襄

2003年4月，在日本同志社大学举办的以“抬头的中国”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曾任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现任日本国际经济交流财团会长的富山襄做了基调讲演。他指出，中国的发展蓝图是到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与现在的日本大体同样的4万亿美元的水平。日本由于通货紧缩、人口减少，到2020年GDP很可能仍然保持在4万亿美元左右。日本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让给中国的日子即将到来，对此必须有心理准备。^⑫

2. 堺屋太一

日本著名评论家、原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曾尖锐地指出，日本特有的“官僚主导协调主义”式的经济体制是将日本从光荣的经济大国弄到今天这种萧条凄惨局面的元凶。^⑬他认为，如果这种官僚主导和官产协调式经济体制再沿续20年的话，日本就会变成经济水准低下，失去政治交涉力和文化影响力，资本、人才和信息都不到日本来的“亚洲的乡下”。^⑭他还认为，经济大国逐渐衰退、倒退为发展国家的事例有许多。例如，阿根廷在20

世纪初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富裕之国。《寻母三千里》这部小说，描写的就是一位母亲从贫穷的意大利热那亚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打工，其儿子为了寻找她也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被那里的繁荣富裕惊呆了的故事。而从现在的常识来看，与 100 年前正好相反，正处于深刻经济危机之中且贫穷的阿根廷羡慕向往富裕的意大利。21 世纪初还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在 21 世纪末将倒退为发展中国家，或许将出现“贫穷的东京羡慕向往富裕的上海”的局面。^⑮

3. 中川八洋

筑波大学教授中川八洋对日本的未来深表悲观。他在 2000 年 1 月发表的题为《出生率低下致使日本国消亡》的文章指出，未来学者哈曼·肯所做“21 世纪是日本的世纪”的那个预测，如今已成为梦想、幻觉。“经济大国日本”正在长嘘短叹中走向完结，不仅如此，日本经济正呈现出根本性的缺陷，“日本大沦落”的征兆已日益明显。日本将不只是从繁荣的经济大国衰退为中等经济水平的国家，而且是日本国本身将很有可能从这个地球上消亡。21 世纪的日本，社会将要解体，国家将要消亡。其理由是，日本经济的未来必然因出生率的大幅下降而日渐衰微。出生率低下将使社会走向解体，而社会解体又将间接侵蚀到经济。出生率大幅下降将致使国家消亡。日本正在迎来空前的最严重的危机。现在的日本人，已经对未来漠不关心，无精打采，沉溺于现实享乐，丧失了顾及子孙后代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中川教授接着指出，1998、1999 年，小渊首相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日本经济界为了摆脱因自己的无能和泡沫膨胀所产生的萧条，发行了几十万亿日元的国债，将偿债负担强加在子孙身上，就是因为稍稍为后代着想一点的精神也被腐蚀了。国家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债务已达 600 万亿日元，已远远超出子孙的偿还能